

文学史料研究·朱洪涛主持

夏衍《新民报》佚文考释

郭昆仑

摘要: 翻检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的《夏衍全集》,仅收录 1946 年前后夏衍为《新民报》所作的九篇文章,这同夏衍及《新民报》同人的回忆不相符契。有鉴于此,文章首先通过厘清夏衍和《新民报》之关系,明晓夏衍缘何选择此份民间报纸代而言说,并由此假借民间人士面目传达大众呼声;其次在详加考辨的基础上,确认除却夏衍这一常用笔名外,锚定朱儒、韦彘、子布、冯游与夏衍联系的密切性,进一步证实前者也为夏衍在《新民报》上使用的笔名;最后由此揭示出,无论是文人论政的政治家形象,还是散文随笔内蕴的人文关怀,都说明夏衍隐伏在多重面孔形象背后的统战思维。质言之,夏衍《新民报》佚文的发掘既有助于补充其彼时的战时生活经验,亦对其思想的整体发掘和研究有必定的价值。

关键词: 《新民报》;佚文;考释;夏衍;朱儒

在《新民报》同人撰写的有关《新民报》报史的回忆性材料中,夏衍始终与《新民报》存在若即若离的关系。但由于缺乏夏衍本人的相应文章,他同《新民报》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有力而全面的揭示。在夏衍写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以下几处文字皆提到《新民报》:1.“中国艺术剧社”成立的消息在《新民报》上刊登;2.“在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除了在《新华日报》上用余伯约、姜添、韦彘等笔名写了不少杂文之外,我还在《新民晚报》、《新蜀报》、《天下文章》、《国讯》等报刊上写过文章”;3. 通过张慧剑给

张恨水送去延安的红枣、小米和毛料;4.“《新民晚报》过去和我们有联系,所以解放后照常出版,一天也没有停刊”;5.1949 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应陈铭德邀请,在《新民晚报》开设《灯下闲话》专栏。^①归结以上几条信息,我们可以推测:夏衍曾是《新民报》的经常读者;1943 年左右,其或用笔名在《新民报》上写过文章。此外,

^①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 504、505、511、606、620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需要梳理的问题是,按照《新民报》在全面抗战胜利后形成的“五社八刊”^①布局,发掘整理夏衍在《新民报》上所发文章,须详细标明日刊或晚刊,以及具体出版地,不能以模糊的《新民报》或1958年改名后的《新民晚报》替代。联系夏衍对《新民报》的回忆和述说,以上他所说的《新民报》,前两条信息大概是指《重庆新民报晚刊》,后两条信息是指《上海新民报晚刊》。由于夏衍1949年后在《新民报》发表的文章大都被《夏衍全集》(下文简称《全集》)收录,因而除补充其1949年后在《新民报》的相关发文信息外,文章着重钩沉和释读夏衍1949年之前发表在《新民报》上的佚文。

一、夏衍与《新民报》关系探赜

严格来说,夏衍与《新民报》同人的联系、交往分别集中在重庆、香港和上海时期,而上海时期又可细分为1946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个时间段。结合夏衍关于《新民报》的三篇未被《全集》全部收录的文章《捧新民报》《迎春忆旧》《祝愿》,我们大概可以复原夏衍自重庆时期起对《新民报》的认识及其同《新民报》的关系。夏衍自1942年^②从桂林到重庆,逐渐接触到《新民报》;1943年秋之后,随着郁风、吴祖光在《新民报》编副刊,夏衍便和陈铭德、邓季惺、赵超构、张慧剑诸人结识并建立友谊,“除《新华日报》外,没有一家报纸敢于评述政事,而《新民报》却别出蹊径,通过社会新闻和副刊上的一些杂文随笔,曲折委婉地反映了一些苦难的人民生活,和渴求民主的心情”^③“当时我在《新华日报》工作,偶有所感而在副刊上写点文章,也常常‘被检’,于是,《新民报》的副刊,便成了我的一块‘飞地’”^④。自此,夏衍使用各种笔名在重庆、成都两地的《新民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夏衍写给黄会林的信件,颇能为其缘何在《新民报》上发表文章张本:“当时我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为什么不给党报写呢?说老实话,理由有二:一是我和《新民晚报》有‘老交情’,(有时《新华日报》不能登或不便登的,《新民晚报》愿意登),二是《新民晚报》是民间报纸,不代表党和政府,写得随便或者放肆一点

也不要紧。”^⑤这一叙说虽然主要集中在1950年前后的上海时期,但同夏衍在重庆时期对《新民报》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即把《新民报》当作除党报外,可以团结的民间报纸。在《捧新民报》中,夏衍充任读者身份对《新民报》,尤其是其副刊的编排特色详加评述:在缺乏纸张和面临严厉新闻统制的困难情况下,《新民报》“没有长篇大论,尽可能节约公式新闻,它把中心集中在社会新闻和反映现实的副刊,这在大后方可以说是唯一的一张接触到人民生活的报纸”,即通过《新民报》可以“看出人民表情”和民间舆论,它是一张真正的“民间报”。^⑥夏衍对《新民报》编排技术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他把自身由读者向作者身份转换的时间节点,锚定在1943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确实颇具象征意义。不唯如此,夏衍此种做法还与周恩来的安排有关。在夏衍到达重庆后,周恩来指示他要“争取公开合法,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战线工作”,将更多人士(尤其是文化界知名人士)团结到中国共产党周围。^⑦其时,《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已然同周恩来、石西民及《新华日

① 即《新民报》在1946年后逐渐形成的重庆、成都、南京、上海、北平(北京)“五社”布局,以及由此五社出版的重庆日、晚两刊,成都日、晚两刊,南京日、晚两刊,上海晚刊,北平日刊“八刊”。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刊物名称上,重庆晚刊、上海晚刊、南京晚刊、北平日刊均明确题名为《重庆新民报晚刊》《上海新民报晚刊》《南京新民报晚刊》《北平新民报日刊》,重庆日刊,成都日、晚两刊,南京日刊题名则较为模糊多样,如重庆日刊的各版报头均无“日刊”字样,成都日、晚刊的第一版报头则分别有“日刊”和“晚刊”字样,因此为避免混淆和明晰准确,参照前四刊题名,本文暂将后四刊名称统一为《重庆新民报日刊》《成都新民报日刊》《成都新民报晚刊》《南京新民报日刊》,并将“八刊”统称为《新民报》。

② 夏衍在《捧新民报》中记为“1941年入川以后”,疑为误记,其实则翌年4月才至重庆。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第474页。

③ 夏衍:《祝愿》,新民晚报副刊部编:《夜光杯文粹:1987—1991》,第275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④ 夏衍:《迎春忆旧》,《新民晚报》1983年1月1日。

⑤ 夏衍:《关于笔名》,《杂碎集》,第12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⑥ 夏衍:《捧新民报》,《上海新民报晚刊》1946年5月2日。

⑦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475页。

报》交往甚深,加上郭沫若、茅盾、夏衍等人纷纷在《新民报》撰写专栏文章,对《新民报》形成“中间偏左”的办报方针颇多助益。

国内全面抗战结束后,伴随着夏衍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陈铭德、邓季惺等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钳制民主、扼杀自由的腐败统治失去信心,《新民报》同人有必要从与之密切交往的夏衍等人身上,获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既为了解政治时事的相关消息,同时为国内逐渐风起的民主自由情势呐喊助威。由此,夏衍才能在吴祖光主编的《上海新民报晚刊》副刊《夜光杯》撰写《桅灯录》专栏文章,并能为各地《新民报》转载,成为标示《新民报》立场的风向标。夏衍同《新民报》由原先的读者与作者的双向互动关系,逐渐向隐在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单向关系偏移,在香港时期初步体现出来。据目前掌握的有限材料,为避免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新民报》同人逃至香港后,曾同夏衍建立秘密联系。^①如1948年秋,已到香港的《新民报》编辑蒋文杰奉夏衍指示,写信暗示赵超构走避香港;后来,赵超构安全到达香港后,同北平社的钱辛波一起访问夏衍,讨论《新民报》如何迎接新中国成立的问题。^②1948年冬,邓季惺在香港介绍四川畜产公司古耕虞和许涤新、夏衍晤谈,劝解古耕虞回北平。^③所有这些蛛丝马迹皆表明:陈铭德、邓季惺非常信任夏衍,且明白夏衍在中国共产党香港工委里的政治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作为上海负责文化新闻工作的夏衍与《新民报》存在明确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夏衍曾给《新民报》做过两次指导性讲话:一是1949年9月20日,北平、上海、南京三社的《新民报》同人聚集于北平,邀请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夏衍到场讲话,就《新民报》今后如何适应新形势等问题作出指示;二是1950年6月9日,夏衍至上海新民报社讲话,就解放后私营报纸有无前途,报纸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及《新民报》的读者对象和内容问题发表看法。夏衍的第一次讲话内容已不可考,^④目前仅能找到第二次讲话内容的摘要。随后,在公私合营时期,当初在夏衍建议

下创办的团结旧报文人的小报《大报》《亦报》相继停刊后,两张小报的工作人员唐大郎(即唐云旌)、沈毓刚、龚之方等人转赴《新民报》工作;和小报的关系类似,夏衍同《新民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质上是中共长期以来在民间社会建构的自上而下、层层渗透的文化网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⑤。上海新民报社曾根据夏衍第二次讲话拟订出一份“讨论提纲”,供全社干部职工讨论,这对《新民报》后来的改版和长远发展有着明确的指导性作用。除此之外,夏衍还曾两次转呈唐大郎、周光楣等《新民报》同人写给胡耀邦请求复刊《新民报》的信件,^⑥看来后者也一直把他当作领导和亲密朋友。

二、笔名考订

《上海新民报晚刊》于1946年5月1日创刊,赵超构任总编辑,程大千任副总编辑,其综合性文艺副刊《夜光杯》先后由张慧剑、夏衍、吴祖光、柯灵任主编,夏衍《桅灯录》专栏和赵超构《今日论语》专栏“三言二语,针砭时事,辛辣犀利,经常为南京、重庆、成都各报转载,成为各地《新民报》的共同语言”^⑦。据当时担任《上海新民报晚刊》编辑的张林岚回忆,沙的《今日论语》和朱儒的《桅灯录》两个专栏

①③⑦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陈铭德、邓季惺等著:《〈新民报〉春秋》,第83、26、5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② 赵则玲:《报界宗师:赵超构评传》,第112-113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④ 据记载,夏衍在胡乔木讲话之后,就《新民报》读者对象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即“《新民报》不妨以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为对象,耐烦地向较为落后的分子宣传,那也是必要的工作”,而“落后分子”指“中小工商业者、广大店员、里弄居民和家庭妇女”等,此处表述和夏衍第二次讲话里的观点重合度极高,疑是对第二次讲话内容的挪用。详见新民晚报史编纂委员会主编:《飞入寻常百姓家:新民报—新民晚报七十年史》,第186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⑤ 施蕾蕾、沈荟:《朋友与同志:夏衍和小报文人交往关系的建构与维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4期。

⑥ 新民晚报史编纂委员会主编:《飞入寻常百姓家:新民报—新民晚报七十年史》,第349-350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在一个时期内几乎成了五社八版的‘共同语言’”^①。此处采用的是赵超构和邓季惺二人的说法。在吴祖光的回忆中,副刊《夜光杯》“另有两个专栏,一个是夏衍先生的《桅灯录》,另一个是袁水拍先生的《月下小景》,这两位作者都十分紧密结合社会现象和发生的事实负责供稿”^②。吴祖光在1944年年末接编《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1945年5月接编《上海新民报晚刊》副刊《夜光杯》时,编排和画版设计,都是夏衍亲自教的。^③于此,足见两人的紧密联系。综上,大致可以得出陈坚、陈奇佳的如下判断:“吴祖光这时还负责《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夏衍以‘朱儒’为笔名写的《桅灯录》与赵超构以‘沙’为笔名写的《今日论语》,两个时评式杂文专栏,被视为版面上的‘两只眼睛’,为《新民报》各地方版所转载,成为报系的‘共同语言’。”^④虽则夏衍本人记不清使用笔名“朱儒”写作的具体文本,“要有文章才能回答”^⑤,但联系陈铭德、邓季惺、吴祖光等人的回忆,可以推知:夏衍的确曾以“朱儒”为笔名在《上海新民报晚刊》发表过文章,且以此笔名开设过《桅灯录》专栏。

查阅几个版本的“夏衍笔名录”,其中并无“朱儒”这一笔名。^⑥陈玉堂在提及“朱儒”时,特别说明,“1946年5月1日,《新民晚报》创刊后,(夏衍)以此名撰写杂文专栏《桅灯录》”^⑦;在苗士心和徐为民各自所编写的书里,皆认定“朱儒”是夏衍笔名。^⑧以上三人大概还是采自陈铭德、邓季惺、吴祖光和陈理源诸人的说法。查考《全集》,署名“朱儒”的文章共有八篇^⑨,分别是《听马思聪》《知堂南行》《关于鹿地》《多疑症》《告示》《上当》《以赌为喻》《勸袁雪芬》,其中,前七篇皆刊载于《上海新民报晚刊》《夜光杯》副刊,最后一篇刊载于《上海新民报晚刊》;此外,署名“夏衍”的《访萧红墓》亦刊载于《上海新民报晚刊》《夜光杯》副刊。《全集》仅收录夏衍在1946年前后为《上海新民报晚刊》写作的九篇文章,这同夏衍和《新民报》同人的回忆明显不符。查考《夜光杯文粹:1946—1966》,共收录署名“朱儒”的七篇文章,分别是《关于鹿地》《听马思聪》《知堂南行》《多疑症》《告示》《上当》《以赌为喻》,以及署名“夏衍”的

《捧新民报》和《访萧红墓》,编者在对“朱儒”的解释项中特别说明:“朱儒,即夏衍(1900—1995),浙江杭州人,剧作家、散文家、新闻工作者。”^⑩据此可以推测,《全集》编者是在参照《夜光杯文粹:1946—1966》后选入上述文章的。《夜光杯文粹:1946—1966》尽管指出朱儒的文章出自《桅灯录》专栏,以及《捧新民报》的发表日期,但并未能说明详细出处的《捧新民报》和署名“朱儒”的其余文章未被编入《全集》。而《勸袁雪芬》能够被编入《全集》,大概是缘于袁雪芬

- ① 张林岚:《走向新中国——回忆解放前的上海(新民报)(晚刊)》,陈铭德、邓季惺等著:《(新民报)春秋》,第384页。
- ② 吴祖光:《(夜光杯)五十周年感怀》,《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第355—35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 ③ 参见吴祖光:《我与夏衍》,《往事随想》,第295页,青岛:青岛出版社,2011。
- ④ 陈坚、陈奇佳:《夏衍传》,第405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初版本见陈坚、陈抗:《夏衍传》,第428—429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相关表述见陈坚、张艳梅:《世纪行吟——夏衍传》,第18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⑤ 萧斌如:《与夏衍交往的日子》,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都会遗踪:沪城往昔追忆》,第126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 ⑥ 编者:《夏衍笔名一览》,会林、陈坚、绍武编:《夏衍研究资料》,第312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陈坚、张艳梅:《夏衍笔名集录》,《世纪行吟——夏衍传》,第274—275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编者:《夏衍笔名录》,沈宁、沈旦华、沈芸编:《夏衍全集·书信日记》,第456—457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以下《夏衍全集》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此外,见徐迺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第529—532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 ⑦ 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第72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笔者按,其中的《新民晚报》即《上海新民报晚刊》。
- ⑧ 苗士心编:《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第216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徐为民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别名词典》,第365、492页,沈阳:沈阳出版社,1993。
- ⑨ 陈奇佳经过考订,认为朱儒所作“第九篇”《书愤》一文亦发表于《上海新民报晚刊》副刊《夜光杯》,恐不确切。参见陈奇佳:《夏衍年谱》,第28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
- ⑩ 新民晚报副刊部编:《夜光杯文粹:1946—1966》,第9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在追忆夏衍的文章里,除援引此文全篇外,还指明文章具体出处;^①比较此文的《全集》版和《上海新民报晚刊》版,《全集》版除漏收两句话外,其余文字内容与《上海新民报晚刊》版几乎一致,编者很有可能查考过原刊。需明确的是,作为选本的《夜光杯文粹:1946—1966》并未收录署名“朱儒”的所有作品,如果仅凭此选本作为《全集》收录标准,显然不合情理。

那么,“朱儒”有没有可能只是一个集体笔名呢?首先,从《新民报》同人回忆及上文夏衍与《新民报》的密切关系来看,“朱儒”应是夏衍在《上海新民报晚刊》上所使用的笔名。其中,还存在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夏衍曾应陈嘉庚、胡愈之的邀请,自1947年3月起担任《南侨日报》主笔,^②并于1947年4月19日在其第8版《南风》副刊《风前人语》专栏上发表署名“朱儒”的《胡萝卜的香味》一文,经比对,该文即刊载于《上海新民报晚刊》1947年1月8日第2版《胡萝卜的香味》一文的改写版,并再次被赋予新的现实政治意义;而署名“朱儒”的《立场》一文经大幅扩充内容后,亦曾重新发表在沙平(胡愈之)主编的《风下》周刊1947年第68期,题目改为《立场与看法》,署名“夏衍”。这也是“朱儒”即夏衍在《新民报》上常用笔名的两则明证。其次,据夏衍自述,他自1946年7月中旬到南京梅园新村,10月10日由南京返至上海,10月30日同潘汉年一起飞抵香港,^③期间等待新加坡入境签证,并于1947年2月19日离开香港。^④即便夏衍在离开上海的一段时间,署名“朱儒”的《桅灯录》专栏文章一直未中断,且夏衍在居留南京时,还曾以“子布”“恽海”为笔名在《上海新民报晚刊》上发文,可见远赴南京并未阻断他在该刊继续发文,香港期间亦是如此。夏衍自1946年9月起就在香港《华商报》陆续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又以转载形式重新刊发在《上海新民报晚刊》上;在抵达香港后,他仍以笔名“冯游”在《上海新民报晚刊》上陆续发文。总之,上海同南京、香港畅通无阻的通讯条件,使得即便身在南京、香港的夏衍完全有条件为《上海新民报晚刊》继续撰写专栏文章。自1947年1月28日刊出最后一篇文章《下效》之后,《桅灯录》专栏再未出现,一

方面是忙迫的夏衍无暇作文,另一方面是身处香港的夏衍无法结合国内突变的具体情势写出具有针对性的讨论文章,而且他和赵超构的“豆腐块”文章的确已经培养出能够写出此种类型文章的地方记者,这也即夏衍文章不再见于《上海新民报晚刊》,并越来越少被其余各地《新民报》转载的部分原因所在。最后,不论是“朱儒”对《奸细》(《今日所感》)和《赛金花》(《女人女人!》)非常熟悉的征引,还是对坐汽车和走路两种出行方式的分析(《立场》),抑或对国际(如美国、日本)与国内(如上海)局势的熟稔程度以及对之展开观察的立场、格局、视野,以及夏衍在他处文字中对“朱儒”深刻的印象,^⑤在在说明“朱儒”应即夏衍所用笔名。

其中,还需仔细分辨《拆与造》与《访萧红墓》两文中涉及的时间问题。如《拆与造》中的“去年途次香港”^⑥与夏衍1945年的行止不相符合,《访萧红墓》中的1946年“双十节”访萧红香港浅水湾墓地也同他1946年10月30日飞抵香港的自述相离合。前者其实是对戴望舒在香港的“附逆”问题表达意见,认为戴望舒创作的民谣“巍巍乎,钟灵塔,今年造,明年拆”^⑦已经很明确地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

-
- ① 袁雪芬:《痛悼“四条汉子”的哀伤》,王蒙、袁鹰主编:《忆夏公》,第420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 ② 沈芸:《夏衍年表》,沈宁、沈旦华、沈芸编:《夏衍全集·书信日记》,第437页。
- ③ 关于上面几个时间节点的详细表述,见夏衍:《懒寻旧梦录》,第565-567页。至于何时离开上海,夏衍在后来的回忆中还有相对模糊的表达,如“46年冬”,见夏衍:《深深的怀念——〈邓文钊传〉代序》,《风雨故人情》,第244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
- ④ 夏衍:《新加坡日记》,沈宁、沈旦华、沈芸编:《夏衍全集·书信日记》,第253页。
- ⑤ 夏衍在《想起了梁漱溟》一文中,特别引用朱儒发表在《上海新民报晚刊》1946年12月11日《还看今朝》里的两句文字。参见佩芝:《想起了梁漱溟》,《上海新民报晚刊》1949年12月4日。
- ⑥ 朱儒:《拆与造》,《上海新民报晚刊》1946年10月18日。此外,有关戴望舒的相关传记也已认定朱儒即夏衍,参见王文彬:《戴望舒年表》,《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第3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⑦ 朱儒:《拆与造》,《上海新民报晚刊》1946年10月18日。

判立场,因而能够排除他的附逆嫌疑。这与夏衍在《关于戴望舒及其他》一文中对戴望舒在港期间“清白无他”^①的判断相一致。袁水拍(笔名马凡陀)读到《拆与造》后,特别创作《戴望舒所作的民谣》一文,再次肯定戴望舒战时创作的歌谣,但“至于晓得内情,晓得是戴望舒写的,则难得一二人而已”^②,夏衍应该在“一二人”之列。那么,或许只是为了使叙述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拆与造》中才有“去年途次香港”一语?“香港近事抄”系列第1篇发表于1946年10月25日,如前文所说,夏衍自1946年9月20日起就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后被《上海新民报晚刊》陆续转载,这是否预示着他至少在1946年9月20日前就已经抵达香港,《华商报》上的文章皆系他在香港所作?如此,他在“双十节”探访萧红墓自然顺理成章,而他所说的1946年10月30日飞抵香港,则为误记。以上只是在有限材料下作出一些合理推测,尚待更进一步的考证和推定。

除“朱儒”和“夏衍”外,大概可以确定夏衍在《新民报》上使用过的笔名还有:

1. 韦彘、韦、韦氏。夏衍曾在全面抗战前集中使用“韦彘”为笔名,并借此发表诸多同电影相关的批评文章;全面抗战期间及胜利之后,此笔名偶被启用。联系夏衍在重庆时期与《新民报》关系的缀述,“韦彘”极有可能是夏衍在《新民报》上使用的笔名。此外,诗人马凡陀(袁水拍)曾写就一首题为《祝新民报》的打油诗,可以视为夏衍在《新民报》使用“韦彘”作为笔名的一个有力证据:“名作如林郭沫老,茅盾老舍叶圣陶,上下古今张恨水,今日论语超构赵,新闻旧闻说夏衍,冰兄龙生漫画妙。”^③袁水拍历数《新民报》上的名家手笔,而“新闻旧闻”当是指《重庆新民报日刊》副刊《万方》上由“韦彘”开辟的《新闻与旧闻》专栏,编者在专栏第一篇《石井菊次郎》文后附有说明:“这是本版新闻的一个精彩的‘专栏’,作者韦彘先生是新文坛一位闻名的作家的笔名。他将逐日给你谈一个人或谈一件事,你必将给它以最多的爱好。”^④而署名“韦”或“韦氏”的三篇文章内容皆同署名“韦彘”的文章相对应,之所以署名如此,大概是编辑的失误行为所致。由此或可认

定,“韦”和“韦氏”是夏衍的另外两个笔名。《新闻与旧闻》专栏里每篇文章的标题后皆标有序号,由于原刊残缺不全或编辑、作者的疏忽,缺少第8、15、17、29、30、46诸篇,《邱吉尔重弹老调》应为第6篇,《希魔未死》应为第12篇,《小螺丝钉》应为第26篇,且多出第36、48两篇。另外,署名“韦彘”且分别刊发在《成都新民报日刊》和《成都新民报晚刊》上的《贺川丰彦》《假情报》两篇文章虽暂时不见于《重庆新民报日刊》,但也应归属于《新闻与旧闻》专栏系列文章,而署名“韦彘”、刊发在《成都新民报晚刊》上的《扶桑哀歌》当是处在延长线上的《新闻与旧闻》专栏系列文章之一。如此算来,《新闻与旧闻》专栏共有系列文章51篇,详情参见文后附录。

2. 子布。“左联”时期,夏衍以“黄子布”的身份同郑伯奇、阿英进入明星电影公司当编剧,后多以“子布”为笔名发表电影评论等方面的文章。署名“子布”的《父亲节的战慄》里的“两个孩子的父亲”^⑤,以及文中对国民党挑动内战的揶揄态度,可以确定此文系夏衍所作。

3. 冯游。此笔名化自王昆仑题字中的“凤游云海,鱼跃江天”^⑥一句,夏衍后多以“冯游”为笔名在香港《华商报》发表文章。署名“冯游”的三篇文章《“汉英升平”——香港近事抄》《香港“民主”——香港近事抄》《鹰狮之争——香

① 编者:《关于戴望舒及其他》,《建国日报》1945年10月24日。具体参见袁鹰、姜德明编:《夏衍全集·文学》(下),第225页。

② 马凡陀:《戴望舒所作的民谣》,《东南日报》1946年11月9日。有关此事件的详细介绍,参见陈建军:《戴望舒的一封辩诬函》,《故纸新知:现代文坛史料考释》,第6-9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2;赵稀方:《香港:报刊与文学》,第187-19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

③ 马凡陀:《祝新民报》,《上海新民报晚刊》1946年5月1日。

④ 编者:《编者附告》,《重庆新民报日刊》1945年6月3日。笔者按,文字漫漶处,暂以□代替。

⑤ 子布:《父亲节的战慄》,《上海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8日。

⑥ 阿部幸夫:《忆夏衍先生——围绕〈懒寻旧梦录〉日译本的往返书简及其他》,王蒙、袁鹰主编:《忆夏公》,第65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岛近事抄》皆是对香港殖民地时事政治问题的观察,其在褒扬英国民主的同时,意在指摘国民党专断独裁的统治。除却以上笔名外,夏衍还曾以“卫君子”为笔名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爱你的敌人》^①、以“侏儒”为笔名在《呼吸》上发文^②,前者待考,后者应为误记。

三、字里行间的政治及其他

由文后附录可知,夏衍在《新民报》上的发文主要集中在《重庆新民报日刊》《新闻与旧闻》专栏、《上海新民报晚刊》《桅灯录》专栏和《上海新民报晚刊》《灯下闲话》专栏,其余皆是零散文章。由于佚文数量较大,本文难以对单篇文章进行详细解读,只能采取“打包”处理方式,从中发掘出核心问题并加以剖析。据夏衍自述,他在《灯下闲话》专栏“一直写到(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为止”^③,涉及写作时间的此段文字被《懒寻旧梦录》征引,只是后面被编入文选或选集时,却被修改。经查,《迎春忆旧》一文陆续被《杂碎集》、《夏衍选集》第四卷、《夏衍七十年文选》、《夏衍全集·新闻时评》(下)收录,除题目均被误作《迎新忆旧》外,只有《杂碎集》和《全集》里的时间同原文表述一致。在经过夏衍参与并定篇的《夏衍选集》和《夏衍七十年文选》两版里,原文表述的“写到五〇年四、五月间”被改为“写到五〇年八九月间”^④,而后出版的《夜光杯文粹:1946—1966》编者同样引用经过修改的原话,认为“写到一九五〇年八九月间”^⑤,《全集》编者仍旧延续这一判断,^⑥依据的应是夏衍曾亲自同李子云“反复研究商定”^⑦的《夏衍选集》里篇目的讲法。在给黄会林的信中,夏衍表示《灯下闲话》专栏从1949年10月起写到1950年6月,有100多篇。^⑧如此,夏衍说法和做法间的龃龉,明显是因对专栏写作时间的记忆模糊不明,顺势给编者的相关修改留下余地。而且,从对《迎春忆旧》一文题目被错误引用、具体发表出处不明、原文被强行修改来看,编者是否对照原报纸认真对校过,亦未可知。鉴于《上海新民报晚刊》《灯下闲话》专栏上的文章大都被收入《全集》,笔者根据收入《全集》里文章的所署笔

名,发掘并整理出疑似夏衍的署名文章,并不做余外的阐释解读。

(一)“别求新声于异邦”

《重庆新民报日刊》《新闻与旧闻》专栏里的多数篇目皆是夏衍对国际时事问题的观察,尤其集中在对英、美、苏、德四国各种类型人物脸谱的刻画上:对以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为代表的“奸臣”行径及其最终下台命运极尽讽刺之能事(《邱吉尔重弹老调》);正面褒扬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苏联的系列言行,无论是对罗斯福的斡旋能力(《三巨头论色彩》)、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机智(《机智》),还是对苏联红军爱好音乐的行为(《多瑙河边》)、斯大林对无数个伊凡们所作贡献的言论(《小螺丝钉》)等,皆表示肯定和激赏;对希特勒(Adolf Hitler)及其追随者则作全力批判(《希魔未死》《假情报》《哈姆生》)。在意识形态批评背后,国际上的苏美或苏英关系成为彼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镜像或写照,寄托其中的依旧是夏衍对苏美或苏英和谐关系的期待。其中几篇对日本问题的观察,涉及日本地方风物、政治、国民精神等诸多方面。夏衍曾在1921年考入九州户畑町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并在1926年免试入读九州帝国大学冶金科,所以对九州是相当熟悉的,正如他所说:“博多是九州第一个漂亮的大城市,面对玄海,风景秀丽,这时候正是海水浴的季节,九州帝国大学,就在这个地方,箱崎海边,现在还有一个元寇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陈铭德、邓季惺等著:《〈新民报〉春秋》,第39-40页。

② 陈理源:《重庆〈新民报〉史话》,陈铭德、邓季惺等著:《〈新民报〉春秋》,第186页。

③ 夏衍:《迎春忆旧》,《新民晚报》1983年1月1日。

④ 夏衍:《迎新忆旧》,李子云编选:《夏衍七十年文选》,第82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⑤ 新民晚报副刊部编:《夜光杯文粹:1946—1966》,第18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⑥ 参见姜德明、袁鹰编:《夏衍全集·新闻时评》(下),第252页。

⑦ 李子云:《后记》,李子云编选:《夏衍七十年文选》,第98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⑧ 参见夏衍:《关于笔名》,《杂碎集》,第12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博物馆,不知道这次挨炸了没有? 福冈对海就是日俄之战中有名的对马岛,沿海岸而西,那就是八幡,茗松,户畑,小仓这一些重要的军需工业地带了。”^①夏衍对日本政治的著述并非始于1927年自日本回国后,他曾在1924年就以“端轩”为笔名写过《日本政界之怒潮》,此文并未被《全集》收录。文章略述日本政友会、宪政会、革新派三派同背后有皇家贵族支持的清浦内阁之间的政治斗争,并评述日本民众对此次多方势力参与政治斗争的态度,即其都不为民众所喜。^②在夏衍看来,它不过是一场无关民众权益的政治纷争而已,这可谓深见。这应当是夏衍较早的一篇颇具政论性质的文章,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日本政局作全面而透彻分析的视野和眼光。对于日本天皇,夏衍很能理解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性地位,“因为尽管现在的天皇成了军阀挟持的一个工具和傀儡,可是在大多数日本人心目中,他的存在是一种宗教性的‘神’,而不单是俗世的一个主义者。日本也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但是超于这一切宗教之上,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日本都无言地奉着这种天皇教的”^③。夏衍以为:“在大多数人民还‘尊敬’着天皇,而他们的观念还不能立即从封建神权的云雾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提出一个不为大多数人所能衷心拥护的口号无疑的将会成为一个运动的阻碍,日本革命者尽管不相信天皇而不提打倒天皇的口号,正和英美革命者尽管不相信基督而不提打倒上帝的口号是一样事情。”^④夏衍并非不了解日本武士道精神,但是,他把“天皇教”的存在等同于基督教,看作是日本国民内心深处的封建意识在隐隐作怪,的确有些过于武断。他的附带进化论色彩的科学理性判断,以及无法超越民族战争的思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窒碍了他对日本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

(二)“小丑”的位置

至于夏衍为何采用“朱儒”作为笔名,我们可以在他的《中国戏剧中的小丑》中找到原因。在这篇文章里,夏衍通过小丑角色谈及中国戏剧谈笑讽谏传统,并特别引述《史记·滑稽列传》中的句子,即“优旃者,秦倡侏儒^⑤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⑥,指出正是由于“在长期

间的专制政治之下,人民学会了讽刺,冷嘲,而这一切也正是人民心中所欲说的言语”,最终得出结论,“在一切艺术部门中,中国戏剧是最‘即于现实的政治’的一种,惟其即于现实政治,而又敢于表白民间的意见,所以它能够逐渐发达而成为具有移风易俗之效的一种真真大众化了的艺术”。^⑦由此观之,笔名朱儒颇能彰显夏衍的志趣,即能以民间人士面目评论时事政治,继而达到讽谏的目的。《檐灯录》专栏里的文章比较驳杂,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讯息,同《新闻与旧闻》专栏一样,可以把它们归于杂文类的新闻时评。^⑧面对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乱象,夏衍以国内外时事影射国民党当局统治,对内则揭露国民党真内战、假和平的虚伪面孔(《“痛快”论》《打仗的后果》《一个比喻》),批判横生的政治腐败(《谁是后台?》《我向往台湾》《不会有下文的》)和国民党虚假的新闻宣传(《从“故”到“云”》《怨毒的宣传》《天才与低能》《如此“遵办”!》《九一书愤》《论宣传》),呼吁国内民主和自由情势(《蛇蜂与民主》)等;对外则批驳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行径(《“参酌各国实例”》《弃大争小》),以及其在此过程中的一系列政治小丑的做法(《掌嘴如仪》《还看今朝》)。这类杂感很能照顾并因应读者情绪,由于主要讨论国内外时事新闻,因此并没有像《新闻与旧闻》专栏里的文章那样,集中论述苏美等大

① 韦彧:《箱崎之滨》,《重庆新民报日刊》1945年6月25日。

② 参见端轩:《日本政界之怒潮》,《民国日报》1924年2月8日、2月9日。

③ 韦彧:《“天皇教”》,《重庆新民报日刊》1945年8月20日。

④ 韦彧:《再谈日皇》,《重庆新民报日刊》1945年8月21日。

⑤ 夏衍引作“朱儒”,参见夏衍:《中国戏剧中的小丑》,《文风杂志》1943年第1期。

⑥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十册,第389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

⑦ 夏衍:《中国戏剧中的小丑》,《文风杂志》1943年第1期。

⑧ 关于夏衍此类杂文的分析,参看陈坚:《试论夏衍解放前的杂文》《谈夏衍解放后的杂文》《论夏衍抗战时期的时评与杂文》,《夏衍研究札记》,第7-36、37-53、176-190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国间关系,而尤其关注日常生活中涉及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俨然就是一篇篇精致短小的“政治思想论文”^①。它们并不作高蹈的推论,而是在字里行间充满形象性的叙述中,通过设问方式,带领读者找出隐藏在时事中未可轻易言传的答案,因此皆是言简意赅的“含英咀华之作”^②。

(三) 随笔及其他

署名“夏衍”的几篇文章皆为随笔散文类的漫谈,多是即时即地的有感而发之作。《为“文明戏”呼冤》标举文明戏也有表现严肃现实政治的一面,这主要是由于“‘文明戏’的戏作者们始终关心着人民,关心着国家,关心着社会,也可以说,他们始终不曾自命清高,而自己置身于民族,国家,与社会之外”^③。这篇文章的思路和《怀予倩先生》一文有相通之处。在夏衍笔下,那些和欧阳予倩的日常交往细节都遍布政治家国的讯息,无论是欧阳予倩为挽救民族危难而深入敌后的行为,还是欧阳父子通信函件里的细腻深情,“一种更伟大的对民族国家的感情掩盖了小我(家)的一切”^④,小家背后的民族国家情怀使夏衍感同身受。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都是夏衍熟识的老朋友,他们从早期文明戏转战话剧并为民族生路热心奔走的形象,让夏衍深受触动,并推动他由对欧阳予倩的个人怀想转向为集体绘制群像。《笑》看似是通过戈果里(即果戈理, Nikolai Gogol-Anovskii)、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堂吉河德阐述一则关于笑或滑稽的文学理论问题,论述重心却在个人因刻板的固定动作而不能适应外在环境变化的内在心理层面,“心理的固定化,失掉人类应有的清醒的顺应力与活泼的柔韧力,也是滑稽的”^⑤。文艺工作者无疑要做到“与世推移”,因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这是夏衍自况和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在多处文字中表达过相似看法。如1940年写的一篇题为《乐水》的文章,即主要谈富于社会性的文艺工作者的诸种特征,而做一个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主要的条件是信仰要坚固,生活要圆转,也可以说,质要硬,形要软,质硬则不论在怎样环境都可以处,可以耐,可以顶住,可以不受影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水一样的维持本性,而作

坚韧的斗争,形软则任何环境都可适应,都可存在,都可深入”^⑥。同样,在香港整风期间写就的《坐电车跑野马》一文也是如此,它同《笑》一样,缺少《乐水》对“山”和“水”两种品格的统合把握,更加强调处在激流时代中的个人求变思想,因而强调“在时代列车急行中,还是尽可能的紧贴在车上吧”^⑦。三篇文章虽然都以非常形象化的方式达到说理的目的,强调内在的自我省思,但区别也是相当明显的:如果说《笑》中还有带着商量语气的恳切劝言,那么《坐电车跑野马》则已然作出不容置喙的判断,《乐水》则并没有把“山”和“水”对立起来,而是努力寻求两者互为沟通的一面,显然更加符合人们思想发展的常态。

结语

至于学界为什么会忽视夏衍在《新民报》上的诸多集外佚文,原因有三:首先,夏衍写作此类文章数量过多,加之有人认为他贪图稿费、党的“高干”在民办报纸上写文章等各种各样的“怪话”^⑧,因此对曾在《新民报》上发表过的一些文章采取忽视的态度;其次,《新民报》还未被“全国报刊索引”等数据库全部收录,特别是它在全面抗战胜利后形成的“五社八刊”布局,无形中为资料的查找设置了诸多困难,好在国家图书馆微缩文献阅览室内有几乎全部的文献资料,查询起来颇为便利;最后,大概缘于它们多是非文学性佚文,故而不受学者重视。笔

- ① 陈坚:《试论夏衍解放前的杂文》,《夏衍研究札记》,第2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 ② 西:《夏衍的杂文》,《上海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30日。
- ③ 夏衍:《为“文明戏”呼冤》,《重庆新民报晚刊》1943年1月22日。
- ④ 夏衍:《怀予倩先生》,《重庆新民报晚刊》1944年11月23日。
- ⑤ 夏衍:《笑》,《重庆新民报晚刊》1944年9月21日。
- ⑥ 夏衍:《乐水——文艺工作者与社会》,《中学生》1940年第15期。
- ⑦ 夏衍:《坐电车跑野马》,袁鹰、姜德明编:《夏衍全集·文学》(下),第291页。
- ⑧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621页。

者先前虽已尝试对相类文章做出一定的发掘,^①但仍觉力有不逮,解读方式略显板滞。正如凌孟华所强调的,在对抗战史料的发掘过程中,非文学性期刊上的内容颇能彰显期刊“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以及凸显中国抗战文学的“杂文学”形态,^②对于夏衍在《新民报》或其他处的相类佚文,我们亦要重视对其的非文学性阅读,密切联系夏衍自身经历、国内外时事政治,以求做到自洽、熨帖的释读,体味夏衍在叙述的字里行间如何顾左右而言他,如何“别求新声于异邦”。本文处理的佚文虽然多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但夏衍同《新民报》的友谊却延续至其晚年,^③继而真正达成其团结民间人士以统战的目的。在此过程中,他采取的并非居高临下姿态,而是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传达隐伏在自我背后的群体意识,从而赢得一众人士的拥护和爱戴。《新民报》佚文的集束发现,对挖掘和丰富夏衍在特殊时期的重庆、上海等地的生活经验,以及整体思想的发展演变,无疑提供了翔实可感的书面呈现。

附录

查阅重庆、成都、上海、南京、北平(北京)《新民报》,兹将夏衍在《新民报》上发文和《全集》外佚文情况整理如下,如文章首发后又在他处发表或被其他著作收录,亦附详细说明。此外,鉴于其中一些著作正文中已注明版本信息,此处不再具录。

一、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署名夏衍的文章(含《全集》外佚文4篇)

1.《为“文明戏”呼冤》,发表于1943年1月22日第2版,后被张慧剑编、南京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出版《夜谭拔萃》收录,题为《为文明戏呼冤》。2.《论“戏德”》,发表于1943年9月26日第2版,后被《夏衍全集·戏剧评论》收录。3.《我们这样的写了〈戏剧春秋〉》,发表于1943年11月14日第2版,后被《夏衍全集·戏剧剧本》(下)收录,题为《后记》。4.《笑》,发表于1944年9月21日第2版。5.《怀予倩先生》,发表于1944年11月23日第3版,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4年11月30日第2版,题为《怀欧阳予倩先生》,文字有部分删减。6.《夏衍来函声明》,发表于1944年12月7日第2版。原文无标题,题目系笔者所加。

二、发表在《成都新民报日报》、署名夏衍的文章(含《全集》外佚文1篇)

1.《芳草天涯》,发表于1945年2月1日至7月31日第4版。需注意的是,此处的《芳草天涯》是以小说形式发表的,而非后来改编成话剧的剧本。剧本曾单独出版,后被《夏衍全集·戏剧剧本》(下)收录。此外,《芳草天涯前记》另刊于《成

都新民报晚刊》1945年11月7日第2版。暂不将其视作佚文。2.《夏衍来函披露〈芳草天涯〉演职员名单》,发表于1945年5月25日第4版。原文无标题,题目系笔者所加。

三、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日报》第2版副刊《万方》之《新闻与旧闻》专栏、署名韦彘的文章(含《全集》外佚文48篇及疑似相关文章3篇)

1.《石井菊次郎》,发表于1945年6月3日,系列第1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6月13日第4版,题为《白鸟家乘》。2.《当心德国外交档案》,发表于1945年6月4日,系列第2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6月11日第4版。3.《昭和的弟弟一偶合乎? 翻版乎?》,发表于1945年6月5日,系列第3篇,实则包含2篇文字内容,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6月12日第4版,题为《昭和的弟弟》,缺少《偶合乎? 翻版乎?》部分。4.《贺尔》,发表于1945年6月6日,系列第4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5年6月14日第2版,题为《贺尔勋爵论》。5.《想起了弗朗哥》,发表于1945年6月7日,系列第5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6月16日第4版,题为《想起了弗朗哥》。6.《邱吉尔重弹老调》,发表于1945年6月8日,系列第7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6月15日第4版,题为《说邱吉尔》。7.《真情的演说》,发表于1945年6月9日,系列第7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5年6月15日第2版,题为《“罗斯福万岁”》。8.《三巨头论色彩》,发表于1945年6月11日,系列第9篇。9.《想起两件冤狱》,发表于1945年6月12日,系列第10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6月19日第4版,题为《两件政治冤狱》。10.《艺人魂》,发表于1945年6月13日,系列第11篇。11.《希魔未死》,发表于1945年6月15日,系列第11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5年6月22日第2版,题为《苏联所得材料希魔未死》,署名韦。12.《机智》,发表于1945年6月16日,系列第13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6月23日第4版,题为《苏联作风》。13.《哈姆生》,发表于1945年6月18日,系列第14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5年6月26日第2版。14.《多瑙河边》,发表于1945年6月20日,系列第16篇。15.《哈哈爵士》,发表于1945年6月24日,系列第18篇。16.《箱崎之滨》,发表于1945年6月25日,系列第19篇。17.《我们控诉》,发表于1945年6月30日,系列第

① 郭昆仑:《从〈十日文萃〉新发现的夏衍六篇佚文》,《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此外,金传胜、邱晶晶亦曾作过此方面的挖掘,参见金传胜、邱晶晶:《夏衍佚文钩沉》,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2016冬》,第165-175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② 凌孟华:《非文学性期刊正名及其重要意义与广阔前景》,《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3期。

③ 有关夏衍晚年同《新民晚报》的交谊,参见严建平:《夏衍与〈新民晚报〉》,《新民晚报》2025年10月26日。

20篇。18.《东京名物之一》，发表于1945年7月1日，系列第21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7月13日第4版，题为《东京名物》。19.《亚梅利与杜德》，发表于1945年7月8日，系列第22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7月15日第4版，题为《哈哈爵士第二号》。20.《洋山薯行列》，发表于1945年7月9日，系列第23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7月17日第4版。21.《人性？》，发表于1945年7月10日，系列第24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7月18日第4版。22.《公民潘恩》，发表于1945年7月11日，系列第25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7月25日第4版。23.《小螺丝钉》，发表于1945年7月12日，系列第25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7月20日第4版。24.《为贝当拟墓铭》，发表于1945年7月16日，系列第27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7月23日第4版。25.《两面》，发表于1945年7月17日，系列第28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7月24日第4版。26.《奇冤》发表于1945年7月20日，系列第31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7月28日第4版。27.《欧战秘史》，发表于1945年7月21日，系列第32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5年7月28日第2版，题为《大战与皇族——无独有偶的两个“和谣”背景》，署名韦氏。28.《内幕记者》，发表于1945年7月23日，系列第33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5年7月30日第2版，题为《横扫一切——美国记者所享有之纪事自由》，署名韦氏。29.《战争与风俗》，发表于1945年7月25日，系列第34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8月2日第4版，题为《柏林风俗何以败坏？》。30.《剪女发》，发表于1945年7月26日，系列第35篇。31.《笼中人》，发表于1945年7月27日，系列第36篇。32.《旧债难清》，发表于1945年7月30日，系列第36篇。33.《赫尔曼》，发表于1945年7月31日，系列第37篇。34.《一张照片》，发表于1945年8月1日，系列第38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8月7日第4版，题为《到底是谁不朽？——一件小事中存寓的真理》。35.《嘘之功用》，发表于1945年8月4日，系列第39篇。36.《弃婴佛朗哥》，发表于1945年8月7日，系列第40篇。37.《追忆二事》，发表于1945年8月8日，系列第41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8月20日第4版。38.《检察官麦南》，发表于1945年8月9日，系列第42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8月19日第4版。39.《“知日派”》，发表于1945年8月10日，系列第43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8月21日第4版。40.《空军之父》，发表于1945年8月14日，系列第44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8月28日第4版，题为《总理远见》。41.《“天皇教”》，发表于1945年8月20日，系列第45篇。42.《再谈日皇》，发表于1945年8月21日，系列第47篇。43.《日本的民主派》，发表于1945年8月22日，系列第48篇。44.《冈村宁次》，发表于1945年8月26日，系列第48篇。45.《士官十六期》，发表于1945年8月28日，系列第49篇。46.《切腹太少》，发表于1945年8月29日，系列第50篇，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9月13日

第4版。47.《“交契”》，发表于1945年8月30日，系列第51篇。48.《大和抚子》，发表于1945年8月31日，系列第52篇。

此外，还有三篇亦署名韦彧、与上属同一系列、疑似转载于《重庆新民报日报》的文章，兹录如下：

1.《假情报》，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5年6月17日第2版。2.《贺川丰彦》，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日报》1945年7月27日第4版。3.《扶桑哀歌》，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5年9月10日第2版。

四、发表于《上海新民报晚刊》第2版副刊《夜光杯》之《桅灯录》专栏、署名朱儒的文章（含《全集》外佚文135篇、非《全集》外佚文及其他相关文章12篇）

1.《此是何礼一女祸》，发表于1946年5月1日。2.《只有羡慕》，发表于1946年5月3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5月7日第2版。3.《欢迎胡佛一面有愧色一郑冰如案》，发表于1946年5月4日。4.《更正栏》，发表于1946年5月6日。5.《蛇蜂与民主》，发表于1946年5月7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5月11日第3版。6.《关于鹿地》，发表于1946年5月8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5月13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5月18日第2版，分别题为《鹿地亘》《关于鹿地亘回日本》，并被《夜光杯文粹：1946—1966》收录。7.《不准苦笑》，发表于1946年5月9日，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5月17日第2版，题为《“报之以苦笑”》。8.《罗夫人语妙》，发表于1946年5月10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5月14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5月16日第2版，分别题为《迟到的杜鲁门》《罗夫人妙语》。9.《从“故”到“云”》，发表于1946年5月12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5月17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5月28日第2版，分别题为《从“故”到“云”》《“故”意隐去·“云”不负责任》。10.《杀人的环境》，发表于1946年5月13日。11.《“读好报运动”》，发表于1946年5月15日。12.《论“协助”》，发表于1946年5月17日。13.《乳牛游行》，发表于1946年5月19日。14.《女人女人！》，发表于1946年5月20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5月24日第2版，题为《姑娘们头上使威风》。15.《听马思聪》，发表于1946年5月22日，后被《夜光杯文粹：1946—1966》和《夏衍全集·文学》（下）收录。16.《肚子问题》，发表于1946年5月23日。17.《再谈肚子》，发表于1946年5月24日。18.《抄两段文章》，发表于1946年5月26日。19.《币弊之间》，发表于1946年5月27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8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23日第2版。20.《希特勒活着？》，发表于1946年5月28日。21.《知堂南行》，发表于1946年5月29日，后又发表于《北平新民报日报》1946年6月8日第2版，并被《夜光杯文粹：1946—1966》和《夏衍全集·文学》（下）收录。22.《从节约谈科学》，发表于1946年5月30日。23.《民意测验》，发表于1946年5月31日。24.《仗是替谁打的？》，发表于1946年6月1日。25.《六月如何？》，发表于1946年6月2日。26.《看报难》，发表于1946年6月3日。27.《哀D.D.T.》，发

表于1946年6月4日。28.《一辆汽车》,发表于1946年6月5日。29.《汉奸的笑声》,发表于1946年6月8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13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25日第2版。30.《“参酌各国实例”》,发表于1946年6月9日,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24日第2版,题为《参酌各国实例》。31.《荒唐不得》,发表于1946年6月10日。32.《怨毒的宣传》,发表于1946年6月12日。33.《“言论遁逃”》,发表于1946年6月13日。34.《民意与威信》,发表于1946年6月14日,后又发表于《北平新民报日报》1946年6月18日第2版。35.《天才与低能》,发表于1946年6月16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22日第2版,题为《辨报与读报》。36.《广“外国也有”论》,发表于1946年6月17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26日第2版。37.《今日所感》,发表于1946年6月18日,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30日第2版,题为《“没用人”的苦闷》,文字有部分删节。38.《原子与金子》,发表于1946年6月19日,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26日第2版。39.《偶感》,发表于1946年6月20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24日第2版,题为《“坏政府”》。40.《危言乎?》,发表于1946年6月21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25日第3版,题为《这是危言还是事实?》。41.《谁是后台?》,发表于1946年6月22日。42.《谨献一计》,发表于1946年6月23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29日第2版,题为《何不告洋状》。43.《文协征屋》,发表于1946年6月24日。44.《我们的乐观》,发表于1946年6月25日。45.《多疑症》,发表于1946年6月27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4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26日第2版,分别题为《多疑症》《时人的多疑症》,并被《夜光杯文粹:1946—1966》和《夏衍全集·文学》(下)收录。46.《“快语”?》,发表于1946年6月28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3日第2版,题为《主教“快语”》,署名“宋儒”。47.《常识之误》,发表于1946年6月29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9日第2版。48.《瞩望七月》,发表于1946年6月30日。49.《警报》,发表于1946年7月1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20日第2版,题为《关于警报》。50.《娱乐城市》,发表于1946年7月2日。51.《艾契生怪答》发表于1946年7月3日,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10日第2版,题为《请派那条巡洋舰》。52.《不过如此》,发表于1946年7月4日。53.《德侨问题》,发表于1946年7月5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11日第2版、《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11日第2版。54.《中美之间》,发表于1946年7月6日第2版。55.《张许之争》,发表于1946年7月8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15日第2版。56.《书痛》,发表于1946年7月9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21日第2版。57.《皮杜尔颂》,发表于1946年7月14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18日第2版。58.《再论皮杜尔》,发

表于1946年7月15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19日第2版。59.《戴错了帽子》,发表于1946年7月18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29日第2版。60.《美国作风》,发表于1946年7月19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26日第2版、《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24日第2版。61.《教授生涯》,发表于1946年7月20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2日第2版、《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26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27日第2版,分别题为《教授生涯》《教授生涯》《学者遭殃》。62.《交通问题》,发表于1946年7月25日。63.《足球与政治》,发表于1946年7月26日。64.《人与言》,发表于1946年7月28日,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4日第2版。65.《中·日·美》,发表于1946年7月29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3日第2版、《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2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7日第2版,分别题为《中·日·美》《这是什么预兆》《中·日·美》。66.《战败国?》,发表于1946年7月30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5日第2版、《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4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12日第2版,分别题为《战败国?》《远东唯一战败国》《远东唯一战败国》。67.《宽大的后果》,发表于1946年7月31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7日第2版、《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5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5日第2版,分别题为《宽大的后果》《宽大政策》《日本女人之言》。68.《喂饱第一?》,发表于1946年8月5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27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18日第2版、《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11日第2版,分别题为《喂饱第一?》《堆积如山的原子弹》《蒲立特政策》。69.《可忧的现实》,发表于1946年8月6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20日第2版、《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13日第2版。70.《德国的实验》,发表于1946年8月8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13日第2版、《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17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14日第2版,分别题为《德国的实验》《德国的实验》《德国的接吻和咒骂》。71.《鬼哭之声》,发表于1946年8月10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15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15日第2版,分别题为《鬼哭声》《鬼哭声》。72.《冷淡得出奇》,发表于1946年8月12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17日第2版。73.《如此“遵办”!》,发表于1946年8月15日。74.《想起褚民谊》,发表于1946年8月16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21日第2版、《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20日第2版,分别题为《想起褚民谊》《我想起褚民谊》。75.《漫画以上》,发表于1946年8月18日,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28日第2版,题为《漫画落伍论》。76.《是谁浑噩?》,发表于1946年8月19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24日第2版、《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26

日第2版。77.《草包政治》，发表于1946年8月22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26日第2版。78.《我向往台湾》，发表于1946年8月23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28日第3版、《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29日第2版、《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31日第2版，分别题为《我爱台湾》《我向往台湾》《我向往台湾》。79.《悲惨，残酷！》，发表于1946年8月25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30日第3版。80.《不会有下文的》，发表于1946年8月26日，后又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8月31日第3版、《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9月2日第2版。81.《奇想》，发表于1946年8月30日，后又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9月5日第2版。82.《勘袁雪芬》，发表于1946年8月31日，后被《夏衍全集·文学》（下）收录。83.《九一书愤》，发表于1946年9月1日。84.《反过来想一想》，发表于1946年9月8日。85.《“合作份子”非“叛徒”》，发表于1946年9月9日。86.《历史的讽刺》，发表于1946年9月10日。87.《幸胜者的悲哀》，发表于1946年9月25日，与姜添所作、发表于《华商报》1946年9月20日的《垂钓之道》一文内容不尽相同，参见《夏衍全集·新闻时评》（下）第145-146页，暂将其视作佚文。88.《弃大争小》，发表于1946年9月26日，与姜添所作、发表于《华商报》1946年9月21日的《本末之辩》一文内容不尽相同，参见《夏衍全集·新闻时评》（下）第146页，暂将其视作佚文。89.《骗》，发表于1946年9月30日，与姜添所作、发表于《华商报》1946年9月26日的《论骗术》一文内容几近相同，参见《夏衍全集·文学》（下）第254页，故不将其视作佚文。90.《骂亦有术》，发表于1946年10月3日。91.《“痛快”论》，发表于1946年10月4日，与恽海所作、发表于《华商报》1946年10月1日的《娼妓相（二题）》里的一节文字内容不尽相同，参见《夏衍全集·新闻时评》（下）第148页，暂将其视作佚文。92.《并非奇谈》，发表于1946年10月8日。93.《“并非奇谈”补》，发表于1946年10月9日。94.《儿皇帝与权相的故事》，发表于1946年10月14日，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10月27日第2版，题为《儿皇帝与权相斗争的故事》，与姜添所作、发表于《华商报》1946年10月12日的《童年的回忆》一文内容几近相同，参见《夏衍全集·文学》（下）第259-260页，故不将其视作佚文。95.《拆与造》，发表于1946年10月18日。96.《典型性格》，发表于1946年10月19日。97.《打仗的后果》，发表于1946年10月23日。98.《慰蒋廷黻署长》，发表于1946年10月24日。99.《MAGIC GROUP》，发表于1946年10月25日。100.《一个比喻》，发表于1946年10月26日。101.《告示》，发表于1946年10月27日，后被《夜光杯文粹：1946—1966》和《夏衍全集·文学》（下）收录。102.《论宣传》，发表于1946年10月30日。103.《司徒先生开玩笑》，发表于1946年11月1日。104.《这样一个模范》，发表于1946年11月7日。105.《平等互惠》，发表于1946年11月8日。106.《应该醒了》，发表于1946年11月15日。107.《悲剧人物》，发表于1946年11月16日。108.《历史的重复》，发表于1946年11月19日。109.《疯狂时代》，发表于1946年

11月22日。110.《潘恩的话（上）》，发表于1946年11月23日。111.《潘恩的话（下）》，发表于1946年11月24日。112.《外衣不可脱论》，发表于1946年11月25日。113.《好法子还有》，发表于1946年11月30日。114.《巧妙·笨拙与贬褒》，发表于1946年12月3日。115.《上当》，发表于1946年12月7日，后被《夜光杯文粹：1946—1966》和《夏衍全集·文学》（下）收录。116.《还看今朝》，发表于1946年12月11日。117.《死而无怨》，发表于1946年12月14日。118.《争具文之迂》，发表于1946年12月18日。119.《别穷追了》，发表于1946年12月20日。120.《掌嘴如仪》，发表于1946年12月21日。121.《物极必反》，发表于1946年12月22日。122.《活的翻案》，发表于1946年12月23日。123.《“某方”》，发表于1946年12月26日。124.《谨防溶化》，发表于1946年12月27日。125.《表情深处》，发表于1946年12月28日。126.《新春试笔》，发表于1947年1月2日。127.《以赌为喻》，发表于1947年1月3日，后被《夜光杯文粹：1946—1966》和《夏衍全集·文学》（下）收录。128.《开药方》，发表于1947年1月4日。129.《脑壳与纸冠》，发表于1947年1月5日。130.《胡萝卜的香味》，发表于1947年1月8日，后经改写，又发表于《南侨日报》1947年4月19日第8版《南风》副刊《风前人语》专栏，题为《胡萝卜的香味》，署名朱儒。131.《拟谈话两段》，发表于1947年1月12日。132.《美国的例子》，发表于1947年1月17日。133.《及时的提醒》，发表于1947年1月18日。134.《免疫性》，发表于1947年1月25日。135.《立场》，发表于1947年1月26日，后经大幅扩充内容后，重新发表于《风下周刊》1947年第68期，题为《立场与看法》，署名夏衍。《立场与看法》一文已被考证披露，见张明强：《新见夏衍佚文五篇考》，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编：《民国文献研究》2023年第1辑，第111-113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暂将其视作佚文。136.《关于媒婆》，发表于1947年1月27日。137.《下效》，发表于1947年1月28日。

此外，还有以其他署名发表于《上海新民报晚刊》第2版副刊《夜光杯》，以及以朱儒为署名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重庆新民报晚刊》《南京新民报晚刊》的文章十篇，兹录如下，其中《死心眼的瑰宝们》《今昔之感》两篇皆应属于《桅灯录》专栏文章：

- 1.《捧新民报》，发表于1946年5月2日，署名夏衍，后被《夜光杯文粹：1946—1966》和丁贤才编、文汇出版社1999年出版《探索——新民晚报研究文集》收录。
- 2.《死心眼的瑰宝们》，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3日第2版，署名朱儒。
- 3.《今昔之感》，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27日第2版、《南京新民报晚刊》1946年7月28日第2版，署名皆为朱儒。
- 4.《父亲节的战慄》，发表于1946年8月8日，署名子布。
- 5.《费正清的风貌》，发表于1946年10月8日，署名恽海，与恽海所作、发表于《华商报》1946年10月4日的《想起了费正清先生》一文内容几近相同，参见《夏衍全集·文学》（下），第255-256页，故不将其视作佚文。
- 6.《羊枣最后译著〈我的爸爸〉前记》，发表于1946年10月17日，署名夏衍，与夏衍

所作、发表于《华商报》1946年10月8日的《杨译〈我的爸爸〉序》一文内容几近相同,参见《夏衍全集·文学》(下),第257-258页,故不将其视作佚文。7.《访萧红墓》,发表于1946年10月22日,署名夏衍,后被《夜光杯文粹:1946—1966》和《夏衍全集·文学》(下)收录。8.《“汉英升平”——香岛近事抄》,发表于1946年10月25日,署名冯游。9.《香港“民主”——香港近事抄》,发表于1946年10月28日,署名冯游。10.《鹰狮之争——香岛近事抄》,发表于1946年11月3日,署名冯游,后又发表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11月10日第2版,题为《鹰狮之战在香港》。

五、发表于《新民晚报》^①、署名夏衍的文章(含《全集》外佚文2篇)

- 1.《夏衍致函〈花讯〉》,发表于1982年2月16日第2版。
- 2.《改进电视系列片〈西游记〉》夏衍致函吴冷西提出四点意见,发表于1982年11月5日第2版,注明转载自《电视周报》1982年11月4日第四十四期,后被《夏衍全集·电影评论》(下)收录,题为《改进电视系列片〈西游记〉》。
- 3.《迎春忆旧》,发表于1983年1月1日第1版,后被《杂碎集》、《夏衍七十年文选》、《夏衍全集·新闻时评》(下)以及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夏衍选集》第四卷收录,收录版题中“新”字应为“春”字之误。
- 4.《祝愿》,发表于1989年10月17日第6版,后被《夜光杯文粹:1987—1991》收录。

六、发表于《上海新民报晚刊》第2版副刊《晚会》之《灯下闲话》专栏、未被《全集》收录但疑似夏衍所作的文章

- 1.《迎一九五零年》,发表于1950年1月2日,署名辛茹。
- 2.《自认与自流》,发表于1950年1月26日,署名江渭。
- 3.《“三八”献言》,发表于1950年3月8日,署名张媿,后被《夏衍选集》第四卷收录。
- 4.《上大课》,发表于1950年4月25日,署名徐同笙。
- 5.《鼓起勇气来!》,发表于1950年4月26日,署名丁理。
- 6.《“上宽下紧”》,发表于1950年5月7日,署名吕宏。
- 7.《“文艺作家”》,发表于1950年5月8日,署名吕宏。
- 8.《“手册”之类》,发表于1950年5月11日,署名吕宏。
- 9.《谈“变”》,发表于1950年5月15日,署名钟培。
- 10.《电影偶感》,发表于1950年5月16日,署名一芹。
- 11.《要注视香港》,发表于1950年5月20日,署名吕宏。
- 12.《靠自己!》,发表于1950年5月26日,署名吕宏。
- 13.《欢庆以后》,发表于1950年5月28日,署名汪瀚。
- 14.《全局观点》,发表于1950年5月29日,署名吕宏。
- 15.《慎于始》,发表于1950年6月8日,署名陈东。
- 16.《分清责任》,发表于1950年6月9日,署名丁萌。
- 17.《谈“白华”》,发表于1950年6月10日,署名汪瀚。
- 18.《投机份

子当心》,发表于1950年6月15日,署名黄贵。19.《“情”与“法”》,发表于1950年6月18日,署名钟培。20.《介绍一篇文章》,发表于1950年6月19日,署名陈东。21.《看了〈太平春〉》,发表于1950年6月24日,署名汪瀚。22.《警惕害群之马》,发表于1950年6月25日,署名陈东。23.《再谈〈太平春〉》,发表于1950年6月26日,署名汪瀚。24.《小巫李承晚》,发表于1950年6月29日,署名陈东。25.《和平签名》,发表于1950年7月2日,署名陈东。26.《看家狗的下场》,发表于1950年7月3日,署名李乾。27.《扑灭投机份子》,发表于1950年7月5日,署名陈东。28.《谁在拒绝批评》,发表于1950年7月6日,署名汪瀚。29.《惊慌与镇定》,发表于1950年7月9日,署名陈东。30.《快与慢》,发表于1950年7月11日,署名钟培。31.《答客问》,发表于1950年7月12日,署名一芹。32.《“以身作则”》,发表于1950年7月17日,署名陈东。33.《新文艺的前途》,发表于1950年7月27日,署名陈东。34.《谈“剧改”》,发表于1950年7月29日,署名李乾。35.《再论“宽大”》,发表于1950年7月30日,署名李乾。36.《苦药之效》,发表于1950年8月8日,署名李乾。37.《谈〈影迷传〉》,发表于1950年8月18日,署名吕宏。38.《中医问题》,发表于1950年8月24日,署名李乾。39.《头脑要冷静》,发表于1950年9月4日,署名李乾。

七、其他

- 1.《在新民报的讲话》,讲话时间为1950年6月9日,整理成文后被《探索——新民晚报研究文集》收录。
- 2.《夏衍、阳翰笙等谈新民晚报》,座谈时间为1982年8月5日,整理成文后被《探索——新民晚报研究文集》收录。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的历史谱系与体系建构”(2024JZDZ04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昆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此处指1958年改名前的《上海新民报晚刊》,其于1958年改名为《新民晚报》。《新民晚报》在1966年后曾停刊,1982年元旦正式复刊。